



九零后的崛起  
司徒朔◎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北大1919 / 司徒朔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177-0711-0

I. ①北… II. ①司… III. ①五四运动—研究②历史  
人物—人物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K261.1②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51047号

书 名: 北大1919

著作责任者: 司徒朔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16号8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77-0711-0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293千字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8.00元

联系电话: (010) 68990646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络订购: <http://zgfcbs.tmall.com>

网购电话: (010) 68990639 88333349

本社网址: <http://www.develpress.com.cn>

电子邮件: [cheerfulreading@sina.com](mailto:cheerfulreading@sina.com)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也许微乎其微，  
但我们正在改变世界！

# 目 录

引子——红楼故事的开始	1
“90”后们——新潮	7
“90”后们——末代士大夫	19
“90”后们——现在就放肆了!	28
老青年	38
诺贝尔奖	47
闲情即心情	55
胡适回来了	65
公理战胜强权是个假面	75
谣言四起	87
领袖蔡元培	97
荆生——惊声	106
评议会	115
朝鲜独立了!	126
正面战争	135
陈独秀走了	146
走上街头	156
同学, 同乡	167
五四	176
救学生	187
蔡元培出走	198

## 北大1919

思想自由	210
学校成为监狱	222
陈独秀被捕	231
胡适在忙什么?	241
1919年的高考	251
胡适和李大钊的论战	263
“监印者”蒋梦麟	275
陈独秀出狱	285
9月20日开学典礼	294
临别赠言	305
半边天	314
杜威的生日	325
北大学生会	335
自杀,还是他杀	346
死亡的季节	357
分道扬镳	366
大学何为?	377
生命的秘密	386
参考文献	396

## 北大1919

城，真正的皇城根下。所以，学生们的消闲胜地，就是王府井的东安市场。当然，这也意味着，如果去天安门，也是方便得很，须臾而至。

地处闹市，当然多了几分生气。可是，不用说近在咫尺的“皇宫”内，总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就是那一份嘈杂和局促，就够一所学校消受的。这或许是个商业店铺的首选，但并非一处求学的理想胜地。况且此时的北大，已经从当年京师大学堂第一次招生“不足百人”，“讲舍不足百间”，扩张为一所1918年招生超过2000人的大学了。

早在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重新兴办京师大学堂开始，选地扩张就是重要议程。当时，他在郊区选定了1300百亩地，谋划建设新校舍，地点在今天丰台区的瓦窑附近。只可惜130十万两的预算，吓跑了西太后。

转眼到了1918年，生气勃勃的北大，再次产生了走出城市的想法。一个学生道出了理想地点。这年夏天，北大组织师生西山旅游队，到风景秀丽的西山消暑度假。英文系学生罗家伦成为《北大日刊》的特约记者。这个学生，一年之前，刚从上海公学考入北大。考试成绩，据说数学零分，但是文章写得才华横溢。负责招生的胡适力荐，蔡元培一点头，他就来到了北京。他的文章，感情充沛，下笔恣意，文字是会向读者眼睛里蹦的。当“五四”来到，那份广场上的北京宣言，就是他在15分钟内一挥而就。而“五四运动”的命名权，也归在了他的名下。请他做记者，再合适不过。

1918年7月5日，罗家伦和同学雇好骡车，放上行李。又坐人力车，尾随而后，出西直门，换驴车奔赴西山。一出城，他就眼前一亮。因为大道平坦而又笔直如矢，不像市内，“天雨一酱缸，天晴

一香炉”。而且道路两旁，“密树成荫”。听说这是拜慈禧太后修颐和园所赐，他感叹，“不得不感谢三千万海军军费”。揶揄取笑一把，无非是文章小料。他建议，北京市内的马路两旁，应该向郊区学习种树，加强市政建设。这也可见北京市内当时境况之差。

尽管路上的儿童乞丐让他震惊，但是罗家伦似乎天生为教育而生。美景如画，清新宜人，让他有些“乐不思蜀”，于是提笔给蔡元培上了一份书：

凡学校建设要素有二：一，精神；二，形式。学风成绩等属于精神方面。建筑设备等属于形式方面。精神不佳，固徒有形式，无益；然形式不佳，精神亦受其累。西方教育家提倡“郊外大学”之议，著有专书。……今校长蔡公对于本校精神方面极力改革。而不能即得心应手者，实因校舍在湫隘城市中之故。如讨山贼然不毁其根据地，则平贼大功终不能告成也。北京建大学适宜之地，厥惟西山。……志于学，一也；树木葱茏，山势俊伟，可养成一种优美壮丽之观念，二也；空气清洁，宜于卫生，三也。有此诸利，势宜急行。现虽困于经济，然吾终愿蔡公有此伟画，以期贯彻于将来。则余在校之期，虽不及待，犹当遥望母校而呼“万岁”！

蔡元培，是认可这个说法的，或许他早就有此想。几个月之后的北大21周年校庆讲话中，他已经信誓旦旦：“学校拟在西山购地建校舍，已经承步兵统领李阶平先生允许极力赞助，当可办到。”可他并没有如愿。

罗家伦为了佐证自己的见解，还特意举出了还只是留美预科的清华学校的例子。认为其精神之佳，和地处远郊外有关。他不会



## 北大1919

想到，1920年，从北大毕业之后，他出国留学，先后就学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归国之后，1928年，31岁，就成了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清华是该浓墨重彩地记住这位校长的。是他正式完结了清华留美预科学堂的身份，归身于国立大学的序列，让学校有了名；广建校舍，广购图书设备，首开招收女生，文理法三科的设置，让大学有了实；整顿了清华基金，让学校有了钱；也是他一次性把55名教授中的37名裁撤，淘汰了冗员，之后延揽名师。清华30年代的巅峰期，大部分教授都是他当时请来的。这其中包括了吴有训、周培源、叶企孙、周鸿经、华罗庚、金岳霖、冯友兰、刘文典、朱自清、蒋廷黻等等。以至于几十年后，身在美国，已经声名显赫的蒋廷黻，谈到平生知己的时候，依然感叹，“我第一知己是罗志希”。这也是认为大学校长第一任务就是聘人的罗家伦，日后非常得意。这让大学有了才。这期间，他还特批招收了一名数学只比他好一点，考了15分的学生——钱钟书。

一所大学有了这些，岂能不兴？

但是，此时的罗家伦毕竟太年轻气盛，加上他张扬跋扈的性格，让他吃亏不小。学生有“驱罗运动”，而此时的中原大战爆发，北京也待不下去。罗家伦非走不可了。实际上，在罗家伦到清华的时候，学生们还驱赶了另外一个人，当时的代教务长梅贻琦。而在中原大战结束后，周炳林、冯友兰等再去请罗家伦回清华时，他或许是伤了心，或许是另有构想，回绝了。之后，学生又赶跑了派来的校长。纷纷扰扰之中，把在美国的梅贻琦请了回来，最后却成了清华至今怀念的校长。



学生永远是对的吗？

1932年，学生和政府的斗法，又在中央大学上演。校长，要么没人来当，要么来一个赶走一个。最终，罗家伦接掌了这所首都的大学。他给中大的目标，是要“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提出了“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于是，类似治理清华的一幕，再次在中央大学上演。几年之内，让这所学校，在当时广受赞誉。以至后来的史家有人评价，此时的中大，要在北大之上。

让人感慨的是，他在这里依旧没实现他当年建设郊区大学的抱负。1936年，执掌中大5年之后，他不满足于中大2千人的规模，也不满城内的市井气。决心在南京郊外建造一所能够容纳5千到1万人的首都大学。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和他亲自到郊外选地，占地8千余亩，要耗资570万元的新校落到纸上。1937年7月1日，罗家伦带着计划书，上庐山谒见蒋介石，获得批准。谁知道，5天之后，“八年烽火起卢沟”。中央大学被迫转移到了重庆沙坪坝。炸弹之下，罗家伦给学生这样打气：“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在这段时间，他对学生的演讲，集结成册，名为《新人生观》。就是这本书，日后被一个人反复提及，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影响，他叫马英九。

1919年的北京，其实有两所“北京大学”。有一所教会的学院，中文名字叫汇文，英文名却也叫“PEKINGUNIVERSITY”。就在1月底，有个美国传教士，名字叫司徒雷登，受命赶到了寒冷的北京。他的使命就是合并包括汇文在内的教会学校，建设一座大学。名字问题，争执不下。汇文坚持英文名字，仍然叫

“PEKINGUNIVERSITY”。但是，司徒雷登虽然一直在江浙一代传教，此时却早就知道，英汉都叫北京大学的那所学校，在蔡元培的任下，已经“出类拔萃”，被塑造为了“国家的知识发电机”。他是不会同意合并后的大学再去用这个名字的。几所学校妥协的结果，学校名定为“燕京大学”。

新学校选址，同样是难题。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有一天他和几个朋友去清华散心。一个学生和他说，“你就选我们对面那块地吧”。他赶紧去看，立刻倾心——有湖，有塔，有山。若干年之后，他把这块有些废弃的园林，建设成为“世界上最美的校园”，也把燕京大学建成了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这里，就是燕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院校调整。燕京大学取消，文理两科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而北大也正式迁移到燕园。蔡元培和罗家伦当年把北大迁移到西山脚下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湖光塔影，历史藏在了水底。

1月1日

## “90”后们——新潮

1918年12月25日，北大放假了。假期11天。此时的学制与如今不同。一年被分为了三个学期。9月到12月，第一学期；1月到3月，第二学期；春假之后，暑假之前的4月到6月，则是第三学期。而当年的农历新年，则是2月1日，假期是从1月31日到2月4日，只有5天。除夕尚且在內，也还是兼顾了传统需求。假期、学期，都以公历为主。

这个年假，北大的师生格外忙碌。陈独秀、钱玄同、陈大齐、刘半农、李大钊等教员在编辑他们的《新青年》，以及刚刚问世的《每周评论》；而学生们，则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他们的新刊物。

未放假之时，学生宿舍里，煤油台灯下，已然多了一批奋笔疾书的人。

傅斯年和他一生的死党罗家伦，以及室友顾颉刚，纠集了一批好友，在为新的杂志《新潮》赶稿子。早在一年前，他们已经在闲谈之间，觉得该办一个杂志。傅斯年后来回忆这个创意：“学生必须有自助的生活，办有组织的事，然后所学所想，不至枉费了；而且杂志是最有趣味，最于学业有补助的事，最有益的自动生活。再就我们自己的脾气上着想，我们将来的生活，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那么，我们何不在当学生的时候，练习一回呢？”闲谈之资，到了1918年秋才变为现实。因为他们最担心的经费问题，文科

## 北大1919

学长陈独秀居然一口答应，由学校负担。

傅斯年的回忆，写在1919年的10月份。预见性颇强，这批杂志社社员，大多未离教育界和出版界：

傅斯年，这名主任编辑，日后成为历史学家，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只手创办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所长，主持殷墟挖掘，网罗了陈寅恪、李济等大师，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重镇。出掌台湾大学仅仅700多天，建基立业，成为台大历史上最受尊重的校长，到今天傅园、傅钟，依旧是台大的精神家园。而台湾大学的校徽，中为傅钟，旁则是他亲自定下的校训：敦品励学，爱国爱人。

编辑罗家伦，后任过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赴台湾后任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务。成为近代有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

顾颉刚，开创了古史辨学派，成为历史学的大师级人物，曾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等职。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毛子水，教育家和历史学家，人称五四时期“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整理国故”的说法就来自于他。

汪敬熙，作家、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冯友兰，哲学家，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俞平伯，作家、诗人，“新红学派”创始人。

朱自清，作家、诗人、学者。曾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等。

叶圣陶，作家、诗人、教育家。

杨振声，文学教授，曾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

张申府，哲学家。

何思源，教育家，后任山东省主席、北平市市长等。

吴康，教育家、哲学家。

李小峰，出版家，取北大和新潮的首字，创办北新书局。出版新文艺作品，囊括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的作品大多委托给他。

孙伏园，作家、著名编辑，号称“副刊大王”。和李小峰一起创办北新书局。

成舍我，报业巨擎，一生创办近20家报刊。其中一子成思危，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谭平山，中国共产党广东党组织的主要创建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

这几十个人，在中国文化史上，可以说是灿如烟花。每一个人，都拥有卓越的历史贡献和地位。这样的撰稿阵容，自然让《新潮》迅速走红，所产生的影响，一度超越《新青年》。1919年1月1日，这份杂志出版的日子，成为史家必书的一笔。一个学生刊物，有此殊荣，恐怕独此一家了。实际上，《新潮》名为1月1日出版，真正从印刷社送来，已经是1月13日。大概是心中忐忑，初版只印了1千册。让大家始料未及的是，半日售罄，之后一版再版，第一册的最终销量，超过万册。对于打击的担忧，对于经费的维系，后日被傅斯年总结为“过虑”。

让后人不解的是，此时，北大社团勃兴，刊物也有几家。为何独独这一个会受到学校的格外支持。陈独秀支持，允诺学校垫资；李大钊支持，拨给一间红楼的房间作办公室；庶务主任李辛白也支持，杂志由北大出版部发行。后人多指向是胡适的因素，只因为傅

斯年和罗家伦等人都追随胡适。这份杂志的顾问，又恰巧是他。焉能不提携？这自然有道理，但是，对于经费紧张的北大，并不能完全靠感情一说来破解谜团。

《新潮》的确是具备成功的因素的。因为，它可能是旗帜最鲜明、定位最准确的一家。英文名字，罗家伦选取了“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的口号已经申明气质。而为了不杂乱无章，立定了三项规则：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目标读者群，也选定为了数量急剧增长的新学堂中的学生。旗号响亮，立场鲜明，受众明确，对一份刊物而言，已经成功了一半。所剩的就是稿件质量。这般人物，怎么会缺如椽大笔？对于一名媒体人，是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的。而恰巧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报人出身。所以，能够获得他们的支持，并不偶然。

何况，他们还有两位领军人物，傅斯年和罗家伦。祖上是清朝第一任状元，诗书传家的傅斯年，才华横溢，旧学功底深厚。胡适后来回忆，要感谢他的支持，才在北大立足。因为他26岁就归国登上北大讲台，在一众老先生中颇为扎眼。学生之中，顿时产生意见。有的说他读书不够多，有的就说他书读得未必比别人多，但是新意颇足。赶走还是不赶走，众说纷纭。结果，哲学系学生顾颉刚请中文系学生傅斯年来把关，他一句“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让胡适过了学生的关，傅斯年也“背叛”章门，一生跟定胡适之。这曾经让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等人颇为不快。这也足见傅斯年一个学生，在北大，在学术和个人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身材高大、走路虎虎生风的山东大汉，傅斯年虽然文名显赫，但却不是个斯文人，天生一股霸气。天真直率，并且终生不改。在

蒋介石面前跷着二郎腿谈天，炮轰孔祥熙，赶走宋子文，都是其杰作。1950年，在台湾的校友举办北大52周年纪念会，他上台演讲，笑着说蔡元培和胡适：“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对自己的尊师，尚且如此直言不讳，足见其耿直，也可见他对自己办事能力的得意。胡适对这个得意门生也认同，后日谈起他，几乎穷尽所有的夸奖词汇，认为他是“天生的领袖人物”，此话不虚。只是让人感慨的是，就在参加完这次校庆会后3天，1950年12月20日，54岁的傅斯年突发脑溢血，猝死于台湾大学讲台。国土无双，英年早逝。

才高八斗、口快心直、说话如滔滔江水的傅斯年，争吵的主要伙伴，就是罗家伦。俩人的共同爱好，是写信给日本丸善株式会社，代买国外书籍；或者跑到红楼里的教员室，去听各种私下的争吵。到了1918年底，他们两位都已经在白话文上登堂入室，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刊发过文章，享有文名。于是，就出现了第一期《新潮》之上，21篇文章里，俩人合力贡献了14篇。居功至伟。

就在傅斯年和罗家伦等人谋划掀起一场“新潮”之时，另外的一批学生，在想着怎样启迪“国民”。与1918年暑假，罗家伦等人悠哉地做“西山旅行”不同，这个暑假，对许德珩等人来说，却颇为忙碌。当年5月，北京高校学生曾经到新华门请愿，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事后，北京各校的学生们建立了学生爱国会。暑假来临，学生爱国会派出许德珩等人南下串联。天津、南京、上海，遍访各地学生、社会名流，并在上海见了孙中山和廖仲恺。9月北大开学的时候，爱国同学会已经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松散组织。

此时的许德珩，已经29岁。阅历，比之一般的学生丰富许多。有过行伍经历的许德珩，同样脾气火爆，和傅斯年一起得了“大



## 北大1919

炮”的外号。只不过，傅斯年的大炮，更多地指向了文化思想，而许德珩则是以爱国著称。当他日后从法国学成归国，成为北大教授之后，这一份感情依旧充沛，是爱国斗士之一。后来创办“九三学社”，新中国成立之后，曾任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当然，他在今天并不如他的女婿名气大，那就是两弹元勋之一——邓稼先。

书归正传，爱国同学会此时也要创办一份刊物，取名为《国民》，编辑部主体班底，自然落在了北大的学生身上。请来了李大钊做指导，《京报》主笔邵飘萍和徐悲鸿做顾问。可是，北大并没有允许这份刊物以北大的名义存在。理由是爱国同学会并非北大校内组织，只能校外租房办公。这并非校方偏心，也师出有名。毕竟陈独秀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也都只能如此办，蔡元培既支持，又都划清界限，当是出于保护北大的目的。他对这批学生同样是爱护的，否则无法解释他会出席国民杂志社的成立会，第一期创刊号写就序言，后来更是撮合了许德珩的婚姻大事。

这样一个组织，却注定要写入史册，因为人。罗家伦后来评价，国民杂志社的人多半是偏实行，而新潮社的人则偏重学术，非常中肯。其主要成员如下：

许德珩，日后成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和学者。

邓中夏，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1933年在南京雨花台被杀，时年39岁。

黄日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主要负责人，32岁病逝于上海。

高君宇，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革命活动家、理论家，中共北方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29岁病逝

于北京。

周炳琳，经济学家，曾任北大法学院院长、西南联大法学院院长，曾任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

段锡朋，曾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代理校长、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

但是，作为一份刊物，《国民》并不成功。和新潮社首期25人的短小精悍不同，国民杂志社员高达180多人，管理就存在问题。本来预期1918年10月第一册就该面世。可是靠会员每人捐款5元凑来的1500元经费，却被人挪用了五六百，造成中断。直到1919年的1月10日才正式面世。落在了《新潮》的后边，起了大早，赶了晚集。其宗旨，被列为四条：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本身就人员混杂，再加上内容注定庞杂，所要改变的人群，又不可能读它。对于拼“眼球”的媒体而言，使用文言文的这份刊物，形象是模糊的。虽然首期封面上，徐悲鸿所画的托腮思考的青年让人印象深刻。但要怎么来启迪民智，这般年轻人尚没找到路径。

为何选用文言文，而不是像《新潮》那样笃定白话文？后来，许德珩回忆说：“因为它是全国性刊物，当时社会上对于白话文还不容易接受。”这句话，是耐人寻味的。它至少说明，白话文等新思潮，在北大形成了高地，但是，当时只是星星之火，社会接受程度并不高。而新潮社，也几乎是把所有能写白话文的一帮兄弟集合了起来，也足以佐证许德珩的回忆。此时，能写白话文的，比如今能写文言文的人，可能还要少。